

# 耕稼三百载，风义桑梓前

## ——陈廷敬家族的家训与家风

□ 朱昌荣

在清朝，大学士陈廷敬的陈氏家族声名远扬。这个家族在山西泽州（今晋城），跨越明清两代，人才辈出，涌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大学士陈廷敬更是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为清初社会的重建贡献卓越，备受康熙帝赞誉，称其为“是极齐全底人”。乾隆皇帝也曾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彰显陈氏家族的荣耀。陈氏家族能成为北方显赫的文化大族，与其独特的家训和优良的家风密不可分。

### 治本于农,诗书传家

历史上的泽州地区，“地接舜畊，故多务农”。陈氏家族在明末时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其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便是耕读。家族向来重视子弟教育，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特意建立家塾，教导子侄读书。他不以体罚威慑，而是以身作则，践行忠信勤俭的品德。

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在《先农坛》中阐述了对耕读的重视：“上治本于农，务兹稼与穡。敢云南亩劳，黍盛在黍稷。种种包元气，粒粒匪易得。民事不可缓，宵昼所当亟。无逸知乃艰，颺风其可则。姬历何八百，首重在民食。”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事不可懈怠。陈昌言的弟弟，即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也继承了这一家训思想。他回忆道，在明朝末年兄长在外为官时，自己依靠耕读管理家政，一点一滴积累起家族的基业。陈廷敬在编撰《陈氏家谱》时也写道“耕稼三百载，风义桑梓前”。

明清时期，陈氏家族堪称“世传诗赋重”的典范，有诗文流传的族人多达256位。陈廷敬曾总结家族诗书传家的特点，认为“其诗书仁义之泽源远流长，所钟祥而挺生者有由然也”。

### 学有渊源,持家有道

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学识渊博，且为人笃孝尚义，在乡党中德高望重。乡人遇到争讼之事，常找陈经济断公道，他讲道理深入浅出，只需几句话就能调解好矛盾，让人心悦诚服。乡里人对他倍加尊崇，甚至有“宁为刑罚所加，不为

陈君所短”的赞誉，可见其威望。

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是程朱理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为学以穷经为首要任务，对《易》《礼经》研究颇深，尤其喜爱程子的《易传》。他一生言行皆符合经义，居家生活作息规律，对母亲孝顺有加，即便母亲去世后，依然保持早起的习惯。他生活简朴，不贪图享受，无不良嗜好，从不因小事鞭打僮奴，饮食简单，常穿破旧衣服，即便面对精美的食物也只是略尝辄止。清人赵士麟认为，陈昌期明白天道人事的原理，懂得盈虚消息的变化，一心积德。这种品德影响了陈廷敬，使其以清望受到朝廷重视，辅佐天子实现文治教化，泽被天下，这正是家学的体现。

陈廷敬的祖母范氏出身官宦家庭，自幼娴熟礼教。嫁入陈氏家族后，持家有道，侍奉婆婆尽心尽力。婆婆生病时，她不解发髻，亲自照顾，甚至为婆婆浣涤厕所。婆婆临终前，希望子孙能像范氏侍奉自己一样侍奉她，可见范氏妇道之贤。

陈廷敬的母亲张氏同样出身官宦名族。张氏孝敬长辈，家中清贫时，亲自承担烹饪缝纫等琐事。张氏子女众多，又要辛辛苦劳作，即便产后三日也会去侍奉赵太夫人。家中米盐器物时常短缺，她常常卖掉簪珥来置办。张氏熟读经书，善于教子，陈廷敬入学后，张氏每晚都会点灯督促陈廷敬的功课，与塾师要求无异。在严格的要求下，陈廷敬得以学成出仕。

### 乐善好施,泽被乡里

陈氏家族有着乐善好施的家风。陈廷敬五世祖陈修为人慷慨，不看重钱财，遇到生活困难的人，总是拿出钱财和粮食救济他们。对于那些无力偿还的人，他会毁掉借据，不再追究，因此被乡人传颂。

陈廷敬的曾祖陈三乐，孝友性成，行义夙具，喜周人之难，扶人之危。凡是有人前来求助，他都会邀请对方坐在槐树下的石头上，尽力满足其需求。即便自己手头不宽裕，也会想方设法周济，不让求助者失望而归。陈三乐去世后，每当遇到饥荒或有人因吉凶之事无力操办时，人们都会感叹，仿佛失去了慈爱的父母。

同治《阳城县志》记载了陈三乐救济乡邻的诸多事迹。在灾年，他减少自己的餐食，等待饥饿的人到来，让他们在槐荫下休息，并提供食物，往来的人络绎不绝，至今那槐荫下的坐石依然存在。有一年年末，陈三乐感染寒疾卧床休息，突然有人前来告急，他想要起身拿出钱财相助，母亲劝阻说风太大，可等到早晨再去。他重新躺下后，却辗转难眠，对母亲说，别人遇到急事来求助，每一刻都如同一年那么漫长。我担心此事无法入睡，这样我们两人都不得安宁。于是急忙起身，拿出囊中钱财给了求助者，笑着说，这下可以安心睡觉了。

陈廷敬之父陈昌期更是常年节衣缩食，储存盈余以备水旱之灾。在明朝末年兵荒马乱之际，他曾拿出全部的粮食储备，不惜毁家纾难。陈廷敬详细记录了此事：“先公治家勤俭，以其余赉给乡人。”康熙二十七年，关中发生饥荒，朝廷发放赈金賑济，陈昌期再次捐助钱粮。此事引起了清政府及官员的高度关注，乡人感恩戴德，甚至请求官府表彰。陈昌期得知后急忙阻止，然而乡人愈发感动，纷纷罢市辍农，向上级请求旌表建祠。最终，此事传到礼部，陈昌期请求停止表彰。礼部官员感叹不已，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乡人对他的怀念和敬颂之情难以抑制，刻石记载其事迹的竟达三十多处。陈昌期临终之时，还拿出篋中的钱财换成米粮，救济邻里。即便当时诸子可能面临无食可吃的境地，他也毫不介意。

陈氏家族数代人始终秉持乐善好施的家风，这一家风也深刻影响了陈廷敬日后的施政。当时的人说，每当朝廷大臣集会议事，陈廷敬总是深思熟虑，讨论的内容也对民生多有裨益。人们称赞他秉承圣主民为邦本的谋略，却不知他其实是深受家风的熏陶。

### 清勤自守,不怀私心

陈廷敬的三世祖陈秀担任西乡尉时，以清操劲节闻名，深受上官推重和乡民爱戴。陈秀是陈氏家族家训的奠基人。他在明弘治年间任陕西西乡县典史时，因担忧子孙荒废学业，撰写教子诗词，强调“勤、俭、学、善、廉”，尤以

“廉”为重。这些诗词成为陈氏家训的基础。如《南官一枝花》：“爷今系宦途，儿独营家计。清勤爷自守，孝友在儿为。爷事儿知，浊富非吾志，宁怀一念私！享浊富徇利亡身，怀私心违天害理。”再如“修职业要如清献（赵抃），不贪财欲比元之（王禹偁）”，训诫后人为官要清勤自守，不怀私心。

陈秀之后，家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日益增多，因此陈氏家族愈加重视官德教育。例如，陈廷敬的祖母范氏就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陈昌言（陈廷敬的伯父）出仕后，她多次告诫他：为吏之道，以廉恕为本。御史以不愧朝廷耳目为得其职。陈昌言对母亲的教诲奉之唯谨，不敢稍有违背。他任职江南学政时，绝苞苴，杜清托，风教丕振畴昔，大力整顿风气。

陈廷敬初为官时起，他的父亲陈昌期就孜孜不倦以清廉告诫他。康熙元年（1662年），陈廷敬回家探亲，其父陈昌期了解了他为官的情况，说：“汝清品正尔难得！”陈廷敬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这句话，都会感动流泪。陈廷敬的母亲张氏也时常写信训诫他。康熙四年，陈廷敬假满回京，张氏告诫他：“慎毋爱官家一钱。”至陈廷敬成为康熙朝重臣时，陈氏家族达到鼎盛。陈廷敬自述：等到我在京城为官，每次父亲有书信寄来，母亲也一定亲手写信来教诲告诫我。我能够一直兢兢业业、坚守本分至今，固然是因为主上给予的不同寻常的恩情，也是父母双亲的教诲才让我这样的。

陈廷敬的次子陈豫朋为清康熙甲戌年（1694年）进士，曾任筠连县县令、湖广省学政等职。陈豫朋在为《午亭山房二集》所作跋中提到，自己学识浅薄，虽在仕途上不得志，但始终牢记先世清白传家的教诲，从未因受贿而身败名裂。集中又有忆先祖句曰：“不负当年过庭语，先公曾许是清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嘉业堂藏书楼是坐落于湖州南浔古镇的百年建筑，创建者是著名藏书家刘承干。嘉业堂多经岁月侵蚀风雨磨削，仍然呈现出雍雅秀润的气质，蕴含着深厚浓重的底蕴，接续着绵长坚韧的文脉。作为知识荟萃之所和建筑审美空间，藏书之楼和楼中之书保存到今天，所依靠的是几代有识之士的文化担当精神。

嘉业堂藏书楼创建的缘起是1907年的亩禾楼事件：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将藏书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事引得大量日本书商携重金来中国购买典籍。刘承干“毅然以斯文为己任”，为保护祖国文脉，开始斥巨资收集贮存古籍。经过一二十年的艰辛搜集，丰顺丁氏静庵、仁和朱氏结庐、太仓缪氏东仓书斋、平湖陆氏奇晋斋、江阴缪氏艺风堂、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等十数家藏书为其所存，湘阴郭调元、诸暨王问清、华阳王氏的藏书也入其囊中。还有许多书商为其提供了大量精品。为了贮存典籍，1920年，他在家乡南浔鸂鶒溪畔购地20亩，经过4年时间修建了精致高雅的嘉业堂藏书楼。对于自己建藏书楼的目的，刘承干说得非常清楚：“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

嘉业堂藏书精要极多。其鼎盛期有宋槧精本经部十七种，史部十九种，子部二十二种，集部十九种；元槧精本经部十六种，史部十二种，子部二十九种，集部二十一种。至于明清二代珍本更是丰富。最高峰时藏书达1.3万部、18万册、60万卷。有许多“精槧秘笈，世间不经见之书”。他还收藏了海量的明清方志、诗文集、

学术手稿。刘承干把这么多的书汇集于一楼，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为了选书的精要，他借助了当时一批版本目录学家的力量，比如缪荃孙、叶昌炽、董康、杨铨羲等，这些人作为嘉业堂藏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承干也为他们提供了优渥的报酬。与此同时，他还聘请了图书保管人员和工友数人，每年支出薪酬甚巨。

对于花费巨资收集的宝贵版本，刘承干从不自秘，而是敞开大门允许各类读者前往阅读研究。他还为来藏书楼的读者免费提供膳宿，有的读者甚至数月在此食宿研读。同时，刘承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刻书工作，把自己所藏之善本和孤本尽量精刻面世，传播于社会，发挥古籍的应有作用。所刻之书以美观精良而著称，除了少量出售外，多数是免费赠送。赠书对象既有他的至亲好友，也有社会贤达和外国人士。赠书的数量有多有少，大多依据对方的需求或爱好。隋唐史专家唐长孺记得少年时刘承干赠予自己所刻书籍的场景，记有前后《汉书》《旧五代史》《章氏遗书》《订讹丛编》《三垣笔记》等书10余种计数百册。梁启超、蔡元培等许多文化名人，以及国内外各类公私图书馆向他

索书，都能得到满足。藏书家傅增湘认为这些刻书活动“成古人未竟之志，启后学向往之心”，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劫掠中国典籍文献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国际势力的重要活动，其中包含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有识之士奋起抗争。1940年1月，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在上海组成了秘密的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郑振铎说：“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孙孙后代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英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在艰难困苦之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开展古籍抢救工作。郑振铎曾两次上了日方计划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

这段时期，刘承干在经济压力日渐窘迫且艰难应付日方逼迫的情况下，社会上传出他将售书的消息。作为占领方的日本方面提出了两种方式：一是以低价购买，二是强行“没收”。在文化使命的驱使下，刘承干通

过多种方式和侵略者周旋，他深明大义，千方百计护持宝贵典籍。他允许郑振铎和从重庆潜回上海的徐森玉连续十多日在自己家阅览书目和典籍。经过多次商谈，他接受了一个策略：日方如果强行购买，可把全部藏书分为三份：上品者售归国家，下品者应付日本人，中品者则向当时的重庆方面请求经费续购。经过郑徐鉴定，决定独取明刊。1941年4月，文献保存同志会以25万元秘密购下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同志会得到最为精要的部分，郑振铎从中挑出最珍贵的82种善本，托徐森玉亲自运抵香港再转重庆，然后通过在邮局工作的唐弢把第二批邮寄到香港。这些工作都是在严峻的情况下，以极为艰辛的秘密方式进行的。郑振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嘉业堂藏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在不同时期，一批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施韵秋是嘉业堂编目部的主任，在近代文化史上他充其量只是作为刘承干的管家而留下名字。在日军占领南浔且大规模屠杀平民的危难时刻，他机智地派工友守护书楼，同时千方百计保护与抢救

藏书。在两名工友被日军杀害的情况下，他秘密把珍贵图书及其他藏书的首册转移到刘承干另两处住宅内储藏。后来他冒着极大风险把一批珍贵图书运回上海。在郑振铎代表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刘氏藏书时，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编目人员为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过。

围绕着嘉业堂藏书楼，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主体努力承担保存文化的责任。1949年5月7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大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给予保护，以重文化。”1949年6月下旬，中共嘉兴县委接到省委、地委转来的电报之后，嘉兴县委书记杨明、副书记沈如凉亲率一连战士到南浔。杨、沈二人检查了藏书楼，部署了保卫工作。第三天连队文书沈向遭到潜伏的国民党残兵的枪击而牺牲，为保护藏书楼献出了生命。1949年8月，连队撤出，由湖州市政府承担起保护藏书楼的任务。

1951年11月，已至暮年的刘承干发函明确表示将所有藏书、书版、设备、楼房及附近空地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来满足“发展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他认为自己平生心

事终将有所托，书物归得其所，自己“易胜欣抃”。

为了嘉业堂藏书楼的保护传承，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图书馆都给予很大的财力支持。浙江省图书馆曾经多次拨款给予整修。198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下拨专项经费20万元，除了房屋维修之外还对展陈格局进行调整。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1992年、1999年、2002年、2007年省政府或省图书馆分别拨款对藏书楼部分进行整修。最近的一次大的修缮自2019年开始，共有藏书楼屋面整体翻修、大木构架刷补和加固、外墙面修缮、明瑟亭修缮等19项工程，经历三年始完成。这也是由财政拨款支持完成的。

嘉业堂藏书楼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的缩影，中华文脉历经千难万险而卓然屹立当世，正是代代有识之士以生命担当文化使命的结果。爱国实业家张元济既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参与者也是刘承干的老友，他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大丈夫道，其中蕴含着深沉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